

中国人何时开始研究埃及文物——潘祖荫的古埃及文石刻收藏

潘佳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埃及学界对晚清以来的埃及学史做了一系列的整理和总结,刘文鹏《埃及学与中国》一文认为,端方是开始搜集埃及文物、研究埃及学的前驱,而根据笔者的研究,可以明确的是,“中国人开始搜集埃及古文物,研究埃及学”至少可上溯近二十年,即潘祖荫主动托人寻找搜集古埃及文的光绪十四年前后。

潘祖荫是晚清时代的学术领袖,累官四十余载,迭掌文衡,为晚清重臣、学林领袖。平生好古文字之学,喜收藏善本、碑版及青铜器,所藏甚富。其学术旨趣在晚清学术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

我国埃及学学者曾关注到晚清学者重视古埃及文字的一些史实,但未注意到潘祖荫亦曾委托驻外使节收集古埃及文石刻资料这一重要事件。根据叶昌炽的记载,潘祖荫曾收藏古埃及文石刻。笔者与潘裕达先生(潘祖荫五世孙)于2008年在国家图书馆发现了张荫桓潘祖荫的两封信札,此后,先后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和国家图书馆发现了潘祖荫旧藏古埃及石刻拓片实物。经比对,两者为同一石刻,国家图书馆所藏为全本,且拓片与张荫桓信中所述完全吻合。为此,结合相关文献,还原潘祖荫收藏古埃及文石刻的过程原貌,充实潘祖荫收藏活动的研究,也为近代中国埃及学的起源研究提供参考。

今年12月,苏州博物馆将举办潘氏收藏的特展,国家图书馆藏的这套拓本将会展出,希望借此文便于学界同好深入认识潘祖荫及相关学者在晚清学术史上的独特地位和作用。

现存潘祖荫藏古埃及文石刻

叶昌炽在《语石》一书中明确记载了他的老师潘祖荫收藏古埃及文石刻的史实,《语石》卷二“欧非两洲二则”(《语石语石异同评》,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147页)中云:

埃及古文,尚在腊丁之先。潘文勤师贻书海外,曾摹得两石。以拓本为范,用塞们德土埴埴而成者,不爽毫发。《晋书》戴逵传,称逵总角时,以鸡卵汁浚白瓦屑作郑元碑,其法正合。其文有如鸟兽者,有如亭台者,又有如云气者,皆古之象形字也。文勤以示门下士,各有考释。亦如明人之释岣嵝碑,但滋聚讼而已。黄仲弢学士得拓本一通,



潘祖荫藏翻刻古埃及卡诺普斯碑圣书体部分拓片(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

系刻之石椁者,西人斐尔士所藏。……此可为宇内最远古之刻矣。

根据叶氏的记录,我们可知:第一,潘祖荫为收集埃及古文,专门写信给海外的朋友,“摹”得两块石刻。第二,石刻的制作方法,是用拓本作为范,用水泥(“塞们德”即英语cement的音译)制成。第三,潘祖荫爱好此物,让门下学生观赏并请他们尝试考释。第四,黄仲弢有一份从西方人那里得来的古埃及文拓本。(黄绍箕,字仲韬,或作仲弢,号漫庵。清光绪六年进士,授编修。历任四川乡试副考官、湖北乡试正考官、翰林侍讲学士、京师大学堂总办、京师编书局监督兼译学馆监督、湖北提学使)由此可见,潘祖荫至迟在1890年逝世前,就已经请人从海外带回两块复制的石刻。

为此,我们希望通过实物调查,来研究潘祖荫收藏的具体是什么。经调查,笔者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部和国家图书馆古籍部分别查到了相关记录,并目验了两处所藏的古埃及文拓片实物。基本情况如下:

1.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索书号05488:1)

著录为:“卡诺普斯(Canopus)碑圣书体象形文(前239年)。翻刻石或曾在端方处,后归潘祖荫,再藏苏州同乡会。”

拓片一张,尺寸为124x77(cm)。封套左下有“柳风堂石墨”朱文印,拓片右下有“北京大学图书馆金石组藏”朱文印。碑文为圣书体文字37行及希腊文2行半。碑文左侧有刻款,据“北京大学数字图书馆古文献数据库”著录:“埃及石碑同治五年出土,光绪十五年二月南海张太仆得之美利加华盛顿博物院,寄赠吴郡潘大司空鉴藏。刑部郎中崇安彭光誉记。”验之原件,除“吴郡潘”三字模糊,隐约可辨外,与著录吻合。

2. 国家图书馆藏本(索书号:各地3552)

著录为:“古埃及文希腊文及埃及文石刻”,内容附注项:“尾彭光刻跋”(当为“尾彭光誉刻跋”),从题名可知国家图书馆不明此碑的内容,故只是著录古埃及文、希腊文、埃及文三种文字。拓片共3张,尺寸分别为:124 x 77.96 x 75.94 x 35 (cm)。三方拓片,首页较大者为圣书体象形文字部分,内容及尺寸与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部藏本同,左侧刻款较北大图书馆藏本模糊。右上钤“周肇祥访古记”白文印,右下钤“北京图书馆藏”朱文印,背贴签条,上书“埃及古石刻 同治五年出土”。第二页为希腊文字部分,古埃及文圣书体文字半行及希腊文76行,经比对,可与圣书体部分缀合,属同碑分段拓印。

第三页为古埃及文世俗体文字部分,74行,右下钤印。(周肇祥,字嵩灵,号养庵,曾任古物陈列所所长)

两件圣书体部分拓片左侧都有刻款:“埃及石碑同治五年出土,光绪十五年二月南海张太仆得之美利加华盛顿博物院,寄赠吴郡潘大司空鉴藏。刑部郎中崇安彭光誉记。”考光绪十五年潘祖荫任工部尚书(据钱实甫编《清代职官年表》,中华书局1980年7月版,第312页),“大司空”当指工部尚书;同年,张荫桓以太仆寺卿出使美国(同前,第1324页),彭光誉以刑部郎中为参赞(参《张荫桓日记》:“是役同行者:……刑部郎中彭光誉,号小圃……”。上海书店2004年2月版,第4页)。在张荫桓书信、日记中也记载了相应内容,且日记中记载刻款字数确为“五十四”字,可知这条刻款是真实可靠的(收藏过程及细节,详见下节)。

卡诺普斯碑,根据西方学者的研究,命名为“卡诺普斯法令”(Decree of Canopus)。中译本《不列颠百科全书》译为“坎诺普斯法令”。它最早于1866年4月15日由三位德国考古学者在今埃及东部发现(古埃及Tanis塔尼斯),故又名“塔尼斯法典”,此后又发现3个副本。该碑先后递藏于埃及的布拉克博物馆(Museum of Boulaq)和埃及古物博物馆(Museum of Egyptian Antiquities)。它是用两种语言、三种字母写成的古代埃及法令。碑阳上半部分刻古埃及文圣书体37行,下半部分刻希腊文76行,碑右侧刻古埃及文世俗体74行。最早由德国学者Reinisch和Roesler以德文释读(Die Zweisprachige Inschrift von Tanis, zum ersten Male herausgegeben und uebersetzt, Vienna, 1866)。碑文内容是公元前238年3月7日,古埃及法老王托勒密三世欧利格特的王后和女儿去世时由祭司们颁布的太阳年置闰系统。据研究,碑文底本是希腊文,古埃及文圣书体和世俗体是根据希腊文翻译而成。其刻立时间早于罗塞塔石碑约100年,是古文字研

究的重要文献,为解读古埃及圣书体和世俗体文字提供了重要线索,也是传世早期希腊文献中较长和较重要的一种,许多学者认为其学术价值仅次于罗塞塔石碑。同时,它也是古埃及历法研究的重要文献。(参《不列颠百科全书》“坎诺普斯法令”词条,中国大百科全书2007年版;以及Birch, et al. Records of the Past: Being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the Assyrian and Egyptian Monuments. 2nd ed., S. Bagster, 1875. vol VIII, pp. 81-90)

而国家图书馆藏的这套拓片,是国内目前仅有的全套卡诺普斯碑碑文,弥足珍贵。

潘祖荫收藏古埃及文石刻始末

上文提到石刻刻款上写明“光绪十五年二月”张荫桓得于美国,然而对其获得过程论述不明。除了现存拓片,结合各种文献,可以还原潘祖荫收藏古埃及文石刻的收藏过程。考现存潘祖荫日记(分藏苏州博物馆、上海图书馆,稿本),找到三处有关埃及古文石刻的文字,分别是:

其一,“光绪十四年十一月初六日癸丑,得刘芝田信埃及古文。”

其二,“光绪十五年七月二十四日戊辰,樵野埃及不到。”

其三,“光绪十五年七月二十五日己巳,仲韬交到樵野寄石三方。”

刘芝田(?-1892),即刘瑞芬,字芝田,安徽贵池人。光绪十一年(1885),受命出使英俄等国,授太常寺卿,迁大理寺,留任为大使,改驻英、法、意、比等国家。光绪十五年(1889),被召回国任广东巡抚。光绪十四年(1888)写信并附埃及古文时在出使外国任上。

樵野,即张荫桓(1837-1900),字皓峦,号樵野,广东南海人。光绪十一年(1885年)